



李鴻章 上冊

中國近代史叢書

目 录

序 转型的忧叹

传播西学第一人——严复

- 3 赌鬼父亲，烟鬼先生和洋式学堂
- 5 二十八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 9 思想界的春雷
- 20 孔教会和筹安会风波
- 25 梦碎夕阳暮鼓中

不懂外语的译界之王——林纾

- 31 男儿热血孝子泪
- 37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 41 林译小说开风气
- 47 新文化运动中的堂吉诃德
- 54 他留下了一个问号

南海圣人——康有为

- 61 空山证圣

- 69 变法大思路
- 74 七次上书，百日维新
- 79 保皇会总长
- 83 一意孤行，大同幻梦

伟大的变色龙——梁启超

- 93 万木初萌
- 97 维新急先锋
- 102 宪政主将
- 105 护国领袖
- 113 出宦海之迷雾，登学术之绝峰
- 120 神龙百变

闹革命的大学问家——章太炎

- 129 天才的幸运
- 132 报界巨擘，倡言革命
- 140 政坛书呆子
- 146 痴人绝学
- 153 孤峰夕照冷

旧翰林与新校长——蔡元培

- 160 “怪八股”与清末翰林
- 161 由教育救国到倡导革命
- 166 从第一任教育总长到北大校长
- 173 新文化运动的守护神

177 穿行教育、学术与政治之间

183 魂归香江

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

189 漫漫求学之路

195 风光的新文化领袖

203 从整理国故到治学文史

208 政治票友与过河卒子

213 离乡背井的晚境

217 无法绕过的身影

以韧战终生反抗绝望的斗士——鲁迅

226 天生的叛逆者

227 岛国中的救国之梦

234 狂人的呐喊

239 彷徨于无地

248 上海滩的论战生涯

258 民族魂

创造与束缚中的天才——郭沫若

267 少年心事

271 为文艺女神歌唱

276 由戎马书生到史学大家

281 文化界的旗手

287 创造与束缚

佛光照射下的一代儒宗——梁漱溟

299 西式学堂与东方佛子

303 佛光烛照下的大儒

308 乡村建设的热梦

312 中国的圣雄甘地

320 铁骨诤友

327 高木清风

余 论 不该遗忘和无法遗忘的

333 崎岖百年路，酒与火的较量……

337 政治、经济、学术……各种引力下的文化旋转

343 上下求索的身影，几种文化抉择的评价

后 记

严
复

传播西学第一人

CHUAN BO XI XUE DI YI REN



严复 (1853~1921年)，字几道，福建南台人。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是一位划时代的、独具魅力的翻译家，他的名字总是与《天演论》、《原富》等著名译著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通过一系列的翻译活动和社会活动，他把当时欧洲比较先进的社会、思想、文化系统地引进中国，所以，他被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也像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早年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在经历了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磨难之后，一方面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悟，另一方面在晚年，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对者转变为拥戴者、崇拜者。这些转变无一不是由于各个时期的生活或者说生存环境促成的，所以，研究严复及其思想，应该从他的一生历程着手。

赌鬼父亲、烟鬼先生和洋式学堂

1853年1月8日，严复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里。父亲好赌，

十赌九输，家无恒产，但却是当地的名医。晚年严复在与侄子的书信中写道：“我家累世为医，积德累功由来日久。”像当时所有的士绅家庭一样，父亲希望严复能够通过科举成为达济天下的儒官，于是在严复7岁的时候，将他送入私塾中学习。严复的塾师黄少岩，虽然有大烟癖，却是一位“汉学与宋学并重的”有识之士。这位黄老师在去世前的两年时间里，让十一二岁的严复了解了宋、元、明三代杰出思想家的处世态度和思想倾向。汉学与宋明理学家的哲学、道德、社会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重事实、重方法严谨、重掌握文化遗产的系统知识”等。当然，这些并不能决定严复后来热情地接受斯宾塞的宇宙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和穆勒逻辑归纳法与经验主义，而他的家庭环境却在幼年给了他这样的可能。

在封建社会，行医是民间知识分子存在的一个重要方式，行医不仅可以救死扶伤，不仅可以在乡亲中获得崇高威望，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一个体面的经济来源。清末的中医在理论上已经与儒学有了千丝万缕的深切关联，但儒学对于中医，不同于士大夫的清议，而更注重实用和经济。所以，严复的家庭给了他一个“合理主义化了的儒学”环境。

这种合理主义的儒学熏陶，为他后来转而学习西洋知识，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866年，严复的父亲严振先病逝，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陷入困顿之中，严复不得不放弃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理想。当时，正逢曾国藩、李鸿章大搞洋务运动，在各地成立了军械所、制造局，招募学生，学习西方的汽机兵械。严复于是报考洋式学堂，并被录取到福州船政学堂。这种从传统教育中走出，接受西洋军事技术教育的转变过程，或者说对于人生道路选择的变化，在当时是非常无奈的，不仅要忍受自己内心失去理想而产生的苦闷，更要忍受来自世俗的歧视的目光。要知道，中国历史

上，对于工匠的定位是非常低的，而洋学的种种军事技能类的知识，在世俗眼中（无论是兴办者还是旁观者），都只不过是工艺，或“用”而已，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严复当然是带着他所受到过的传统思想，去接受新知识的，如他的入学考试作文题目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文中，他对刚刚去世的父亲和承担着所有家庭生活重担的寡母倾注了一片深情，同时，可以从文中看出在严复的心目中，家长的尊严和儒学的道德是何等的重要。这种在传统伦理道德上嫁接西方近代学术的知识体系，影响了严复几乎一生的政治和学术道路。

船政学堂仿照西方的学制，聘请西人执教，所学课程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平面三角、立体三角、代积数、动静力学、流体力学、电磁学、光学、声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这些系统的学习，为严复掌握外语和近代学科的基础知识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在学习中，西方科学要求的精确性和能力训练与严复原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得以有机结合，而严复严谨的治学态度来自他早年受到的“汉学、宋学”的治学方法的训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严复对科学产生的热情来自于科学本身。

综观严复的少年时代，我们可以幽默地认为，正是赌鬼父亲、烟鬼先生和洋式学堂，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基础和倾向。

二十八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1871年，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派到“建威”练习舰上实习；1872年，他被调到“扬武”兵舰，还曾经随着军舰巡历黄海，

访问日本，见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工业飞速发展的景象，深有感概。1874年，日本勾结美国，出兵侵略台湾，清朝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率领水军赴台湾增援，严复在“扬武”舰上完成了测量台东各海口的任务，受到沈的褒奖。

严复的学识和操作才能也得到“扬武”舰的英国籍教习托莱西的高度赞扬，后来，在托莱西的帮助下，严复获得了赴英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1877年，当严复最终被送去英国深造时，无疑他已成为一个幸运的人。他获得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有的、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和身心亲自领略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变化。这个机会，也最终决定了严复今后一生的发展都离不开作为中西之间的比较、媒介的角色。

严复在去英国之前，已经对西学有所掌握，对这些知识也非常有兴趣，与那些“蛮夷”教习们相处得很愉快，所以，与那些希望通过开办西式工厂、洋务赚钱的洋务派官僚不同，在严复的头脑中，有关西方道德、理智和精神低于东方的观念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

严复本来是带着一个已经使他人迷的问题到达英国的，这个问题构成了他所有观察、思索的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问题不是由他自己提出的，而早已是洋务派人士头脑里的一个大问号，严复也是其中的一人。这个问题就是，西方富强的秘密是什么？首先是英国富强的秘密何在？正是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不是闲逸的好奇心，引导严复热切地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且最终导致他全神贯注于当时英国思想界的研究成果。

伦敦的留学生活，使严复耳目一新、眼界大开。置身于西方社会国情民俗中，严复切身感觉到西方不仅在军事科学技术上值

得学习，更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法律和西方文化源流、思想体系等方面值得借鉴。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19世纪的工业、商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造船业、纺织业、钢铁业、采矿业都很发达。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政治民主制度比较完善，自由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1848年，工人市民发动了争取选举权的宪章运动；1867年，议会宣布改革法案，承认城镇工人的选举权，使英国选民人数增加一倍；1871年，法律承认组织工会的权利；1875年，承认罢工权利。当时，著名实证主义哲学家穆勒刚刚去世不久，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还健在，他们的思想学说正风行英国。这几位思想家的名字深深地印入严复的脑际，大大扩展了严复的思想视野。

身在繁荣发达的英国，回顾落后贫弱的祖国，严复不能不有所感触，在对二者的比较中，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修远求索。

严复为求得答案而热切探索的精神吸引了中国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他们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论析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勿休”。郭嵩焘的认识超出了同治朝廷政治家的“自强”公式，认为欲求富强只有竭尽全力全面学习西方才能达到目标。郭在英期间的最大收获，是使自己的思想大大超过了国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官僚们。他看到西方的富强中包含着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秩序，以及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等众多的内容。郭公使曾经与严复热烈地交换过对这些制度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共识。

1879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英国海军大学，回国后在船政学堂担任教习。李鸿章将严复调到新设的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1890年，严复成为该校总办。

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在他的脑海里，资本主义的政教文明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君主立宪、自由平等，以及当时风行西方的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

然而，当时洋务派掌权者李鸿章虽然欣赏严复的才干，但并不打算重用他，因为他不是李鸿章的心腹。在以后很多年里，严复虽然也担任着看起来比较重要的职务，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掌握过实权，始终作为“局外人”，不能参与决策，这正是他感到对政治十分沮丧的根源。

青年时期的严复，书生意气，“得志当为天下雨”的诗句表现了他胸怀的宏伟抱负。他“往来于京津之间，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严复在封建士大夫之中已经很有声望，他在同事、朋友们面前议论朝政，指陈时弊，往往鞭辟入里，满座愕然，甚至引起李鸿章的不满。

严复在水师学堂渐渐体会到了自己的孤立，但他不明白这种孤立的原因，而认为是由于自己并非出自科举正途，所以才不被权重者接受。“自惟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蚩”，严复在思想感情上曾经对科举制度及其考试内容八股文深恶痛绝。但是，为了迎合世俗的观点，也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或者说为了给自己内心深处的早期梦想一个安慰，竟然开始钻研起了八股文。遗憾的是，他在八年之中四次参加科举考试（1885年，1888年，1889年，1893年），但都没有考取。这期间，毫无疑问，严复经受了难以想像的羞辱。没有像其他封建知识分子那样有个所谓的“进士”名分，始终是严复心中无法抹去的遗憾。在1895年之后，严复的这种痛苦使他对旧的考试制度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抨击。在严复晚年，清王朝为了笼络民心，诏令对詹天佑、严复等19名留学生，赐以文科进士出身。

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严复，在巨大的苦闷中，竟染上了鸦片

癮，这不能不说是西方理念与中国当时的现实激烈碰撞所产生的、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

严复后来尝试着转向兴办实业。他曾经投资朋友在河南开办的煤矿。这种对私人企业的兴趣反映了他希望取得经济上的自立和从英国带回来的新的价值观念。

在 1894~1895 年关乎中国命运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向西方学习不到 30 年的日本，竟然战败了中华帝国！严复终于一扫过去对政治的沮丧，开始义正词严地向剧变的社会提出了严峻的历史课题：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五千年文明古国面临历史选择，一任故步自封坐以待毙？还是改弦更张死里求生？看起来，洋务运动带给中国的仅仅是不堪一击的富强美梦。

严复从 1895 年 2 月 4 日到 5 月 1 日，在天津《直报》上大声疾呼，连续发表了五篇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通过多方位的参照，把中西不同的文教、政治，以及道德、风俗进行对比，从理论上对变法维新的迫切性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回答了严峻的历史课题：“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指出了民族的复兴之路：“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这几篇论文实际上构成了严复全部译著的绪论，而且还洋溢着一种久所欲言一吐为快的强烈感情。

思想界的春雷

这一阶段严复的活动重心由海军界转向思想界，开始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转变。在此时期，他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译著《天演论》，即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在译文中，不仅文

笔典雅，而且在原书的章节之后，附加了大量按语，对赫胥黎的思想有析有评，同时还介绍了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斯以及古代希腊哲人的思想学说，从而也反映出严复自己的观点和倾向性。严复接受了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动植物与人类社会不能抗拒之铁律。严复认为这种理论“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他指出，在帝国主义瓜分危机下，只有奋起图强，适应“天演”规律，才能避免亡种之祸。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已有了一些确切的证据证明了严复思想发展的轨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他认为，在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中可以找到西方富强的秘密。因此，在以后的年月里，他继续阅读“有见识”的西方思想、政治、法律著作。早在1881年，他就曾经读过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即严复译的《群学肆言》），斯宾塞的理论影响了严复终生的思想。

斯宾塞在《社会学研究》一书中，阐述了他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观点。严复在英国期间就已经熟悉了达尔文主义，也接触过斯宾塞的其他著作。严复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一些观点可以与中国儒学的经典——《大学》、《中庸》等中的经义相印证。斯宾塞认为追求真知与克服感情及道德上的偏见应该有机联系起来，即必须具有本质上属于道义性的超脱感。而《大学》和《中庸》中也有些段落的意思是将诚意正心与追求真知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学》里有段名言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严复强调，诚与知两者是相冲突的关系，但基本点仍是与“知”相辅而行的。

严复希望通过揭示西方科学高水平的伦理学基础，以提高西学在绝大多数对西学持敌对态度的文人学士中的信誉。严复曾经说，他“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但在读了斯宾塞的书以后，才

发觉自己的错误。可以说，斯宾塞使严复坚定了对中国古籍中存在的“至善”、“睿智”的信念。

斯宾塞的理论让严复激动不已，不仅仅是由于一个西方思想家证实了中国古代圣人之言，而是由于该书明确说明了真知——反映和导致“诚意”的真知，显然就是以西方科学的方法所能找到的知识。也就是说，过去被轻视的所谓“用”——各种科学知识，意义不仅在于各自的具体应用，还在于这些科学所涉及到的方法，包含着通向真理本身的钥匙。正是科学的修养使人们得以驱散感情的迷雾，古代圣贤梦寐以求的也就是这种理想。换言之，正是西方科学，才能真正保证以德行为其追求目标，坚守《中庸》所阐述的“中庸之道”。

但是严复在这里遇到一个以后也经常缠绕他的问题：达尔文和斯宾塞所描述的不具人格的进化动力是无所不能的。那么，为什么这种动力只在西方才得以发挥作用，而在中国却陷于泥沼呢？很明显，这是因为近代西方的智者清楚地懂得了进化过程。正如中国古代社会抓住了自然的静态和循环的表象，因而得出社会几乎不变的看法那样，近代西方社会抓住了“运会之所由趋”，因而能使进化动力不受限制地转化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同样原因，中国文化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进化的作用过程。在严复的眼中，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不只是描述了现实，而且还规定了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这个理论才是真正的“力量和源泉”。严复在《物种探源》中对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的解说中，用语就已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了：“‘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作为一门科学，其价值并没有使严复产生多大的兴趣，很明显，

严复强调的是竞争（一种确定无疑的活力）的价值观，强调的是在竞争的形式下，对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挥。因此，“爪牙用而杀伐行”的形象描绘非但并未使他沮丧，反而使他兴奋。

所以，严复在向达尔文谦恭敬礼后，随即转向更与自己接近的斯宾塞，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严复认为，斯宾塞将达尔文的真理在人力事务中作了极为重要的运用。通过斯宾塞，达尔文主义中那些引人注目的话语立即与严复先前的基本思想联系起来了。

此期的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正极力主张“保教”，但究竟什么是“教”呢？康有为认为，“教”就是经过改造后的以孔子为救世主的儒家今文经学，即融合着《公羊传》某些模糊含义和西方发展思想的混合物，而不是儒学者眼中纯正的儒学。严复与康有为和梁启超不同，因为他亲自看到了西方的文物制度，他直接用外国的语言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的理论著作，所以他与他们的政治观点虽然都含有维新的成分，但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1897年，严复给梁启超的一封书信中写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这个“教”，为君主立宪的政体设计提供了准宗教的依据，也体现了严复等“为民之教”的思想。严复没有为儒教作任何肯定，尽管他实际上是支持梁启超关于君主政体的主张的。

关于这个问题，5年后，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说：“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殫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不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然后他列举了日本明治天皇、普鲁士国王菲特列大帝及俄国彼得大帝的改